

原來，楊子所「自言自語，令人不知所云」（序文），「以寫小說來渲洩心中的塊壘」（序文），是在宣揚一種基於自私的心理，需要由別人的犧牲來滿足自己的愛情。我們不禁要問：這種不平等的愛值得提倡嗎？

一部濃縮的台灣同胞抗暴史

楊遠畫像，林梵著，筆架山出版社印行。

曾心儀

本書作者林梵先生是一位治歷史的有為青年（王詩琅序），他不僅詳述書中主人翁楊遠先生個人的經歷和文學創作成長的過程，同時為讀者展現出近代中國苦難的歷史，以及台灣同胞在異族統治下屢蹶屢起的抗暴事蹟。林梵並廣泛地收集有關文史評論等資料，幫助讀者了解楊遠作品的意義和真價。日據時代台灣的文學家，光復後因為語言文字的障礙而一一沉寂。直到退出聯合國等一連串時事的衝擊，國人對文化前途產生反省，文壇上才呼籲注意關心民族，關心社會的民族文學和社會文字。很自然的，對於土生土長的台灣文學開始另眼看待。年輕一代的讀者原對「楊遠」毫無印象，從一篇篇陸續推出的介紹文章、討論文章，以及楊遠的作品重登，他們才初識這位民族文學家的面貌，並也同時了解到台灣的近代史。整理台灣抗日史和文學史已成為政府和文教界一致的方向，林梵先生著「楊遠畫像」當是一件奠基的工作。

楊達於一九〇五年生於台南農家，十歲時目睹「噍吧年革命」慘劇。台灣同胞反抗日本殖民主義者的統治迫害，拋頭顱灑熱血，如果不會閱讀歷史，我們怎知我們的腳所踩的土地上曾有先民的鮮血和眼淚？對帝國統治者而言，抗暴是「匪亂」，日本帝國編纂「台灣匪誌」把「噍吧年事件」列入「匪亂」，少年的楊達看了很憤怒，決心走上文學道路，以小說的形式來糾正被編造的「歷史」（五十五頁）。

在日本的工讀生涯，楊達做各種待遇極低的臨時工，心中大有感觸：「出賣台灣的辜顯榮怎麼可能真心為台灣同胞說話呢？我將來一定要跟民眾站在一起。」（七十一頁）

日本在一九二一年產生了第一個全國性的工會組織——勞工同盟，後又產生有史以來最大的農民組織——日本農民組合。楊達的思想深受這些事件的刺激，並參加日本的勞工運動，從運動中更確定了他的信念（八十頁）。返台後加入農民運動，抵抗日本政府搜刮農民的土地。在農民運動中認識了一位走出傳統的新女性——葉陶，結為革命夫妻。

「她的女權主張和我的活動配合，目標是一致的。這種女權運動是針對整個社會，並不僅是在家庭裏向丈夫爭平等利益而已。」（一七七頁）

這對共患難的革命夫妻，合力推動著眼於大局的新文學，實足以為新青年的楷模。對於今日文壇上泛濫著虛情、夢幻的作品，草率成書的現象，不啻是強烈的對比。

有位服務於台中的日本警官入田春彥思想前進，很傾心楊達的作品，兩人一見投緣。入田不僅代楊達解決生活上的困難，並且屢次批評日本政府作法不當，而遭到驅逐出境的處分。入田接到處分後，選擇了自殺做為抗議。由此可見，帝國主義是世人的公敵，對內迫害具有正義感的同胞，對外侵略弱小國家。而反帝國者的團結，亦不是刀槍所能分割的。

楊達的小說大多寫日本殖民地時代的台灣，寫當時社會四個主要階層人物間的利害關係

：殖民者、走狗、知識份子和一般民眾（二二九頁）。他所辦的各文學刊物也都一致地選用反映現實的作品。「台灣文學」第二輯有一篇署名「愁桐」寫的短文「春日豬三郎搖身三變」，描寫一個鄉下保正，台灣社會運動昂揚時，他也跑到演講台上演講。「皇民化運動」轟動時，他又變成第一代皇民。日本投降，陳儀要到時，他又成了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的主席了。但誰敢保他不再來一變？（一五二頁）

時代在變，人的腦筋也在變，甚至變了姓氏的也不少。有的變木村，有的變大衛。我姓楊是不會變的。」（二一五頁）

縱觀楊達過去七十多年的歷史，他的信仰始終貫徹不移，不管環境多麼惡劣，受到多少的迫害，他都不改其志。其夫人葉陶女士與他胼手胝足，開拓首陽農場，一家人在大地上歷煉，這種踏實的勞動精神是多麼地可貴。這種精神是我們這一代青年所缺少的，所應該學習的。

「楊達畫像」一書，實在是彌足珍貴的社會教材和歷史著作。我們更希望，曾在本書中出現的諸先烈、文學家的傳記也能陸續問世，這還有待歷史學家們共同努力。

向人類抗議的一本書

昆 俞

大屠殺，Gerald Green 著，景翔譯，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印行。

在歷史上，人類意識形態的偏差，一直是導致悲劇不斷產生的引火線。中古世紀基督教